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

中国网络社会研究报告

2014

STUDY REPORT OF
INTERNET SOCIETY IN CHINA

主 编 刘少杰
副主编 王建民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

中国网络社会研究报告

2014

STUDY REPORT OF
INTERNET SOCIETY IN CHINA

主 编 刘少杰
副主编 王建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网络社会研究报告. 2014/刘少杰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4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
ISBN 978-7-300-19137-9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计算机网络-社会问题-研究报告-中国-2014 IV. ①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8814 号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

中国网络社会研究报告 2014

主 编 刘少杰

副主编 王建民

Zhongguo Wangluo Shehui Yanjiu Baoga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印 张 17 插页 1
字 数 303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6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编委会

主 任 陈雨露

副主任 冯惠玲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中	王孝群	毛基业	冯惠玲	刘大椿
杜 鹏	李路路	杨伟国	杨瑞龙	吴晓求
陈雨露	陈 岳	郝立新	贺耀敏	袁 卫
倪 宁	郭庆旺	董克用	韩大元	温铁军

总序

陈雨露

当前中国的各类研究报告层出不穷，种类繁多，写法各异，成百舸争流、各领风骚之势。中国人民大学经过精心组织、整合设计，隆重推出由人大学者协同编撰的“研究报告系列”。这一系列主要是应用对策型研究报告，集中推出的本意在于，直面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开展动态分析和评估预测，建言献策于咨政与学术。

“学术领先、内容原创、关注时事、咨政助企”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的基本定位与功能。研究报告是一种科研成果载体，它承载了人大学者立足创新，致力于建设学术高地和咨询智库的学术责任和社会关怀；研究报告是一种研究模式，它以相关领域指标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评估现状，预测未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研究报告还是一种学术品牌，它持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焦点和重大战略问题，以扎实有力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以及企业的计划、决策，服务于专门领域的研究，并以其专题性、周期性和翔实性赢得读者的识别与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学术思考。我校素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注重学术研究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曾陆续推出若干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譬如自2002年始，我们组织跨学科课题组研究编写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文社会发展研究报告》，紧密联系和真实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发展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十年不辍，近年又推出《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等，与前三种合称为“四大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散在的不同学科的专题研究报告也连续多年，在学界和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报告都是观察分析、评估预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其中既有客观数据和事例，又有深度分析和战略预测，兼具实证性、前瞻性和学术性。我们把这些研究报告整合起来，与人民大学出版社相结合，再做新的策划、征集、遴选，形成了这个“研究报告系列”，以期放大

规模效应，扩展社会服务功能。这个系列是开放的，未来会依情势有所增减，使其动态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还具有关注学科建设、强化育人功能、推进协同创新等多重意义。作为连续性出版物，研究报告可以成为本学科学者展示、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编写一部好的研究报告，通常需要集结力量，精诚携手，合作者随报告之连续而成为稳定团队，亦可增益学科实力。研究报告立足于丰厚素材，常常动员学生参与，可使他们在系统研究中得到学术训练，增长才干。此外，面向社会实践的研究报告必然要与政府、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关注社会的状况与需要，从而带动高校与行业企业、政府、学界以及国外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收“协同创新”之效。

为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在出版纸质版本的同时将开发相应的文献数据库，形成丰富的数字资源，借助知识管理工具实现信息关联和知识挖掘，方便网络查询和跨专题检索，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适用的增值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是我们在整合科研力量，促进成果转化方面的新探索，我们将紧扣时代脉搏，敏锐捕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焦点问题，力争使每一种研究报告和整个系列都成为精品，都适应读者需要，从而铸造高质量的学术品牌、形成核心学术价值，更好地担当学术服务社会的职责。

目录

导论 网络化时代社会认同的深刻变迁	1
一、社会认同研究的转变与限制	2
二、网络化时代的社会认同分化	5
三、从集体表象到社会表象的提升	8
四、社会认同变迁在中国的特殊意义	12

年度主题报告 网络反腐

第一章 网络反腐：互联网时代的利益表达与权力监督	19
引 言	19
一、网络反腐的内涵与背景	21
二、网络反腐的实践过程	29
三、网络反腐的主要特点	36
四、网络反腐的政治意义	42
五、网络反腐的社会意义	48
六、网络反腐中需要处理的几对关系	52
七、网络反腐的限度及对策	57
结 语	62

年度专题报告

第二章 结构性压力下的非理性宣泄：“保钓游行”背后的社会意义	69
引 言	69
一、“保钓”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71
二、非理性行为背后的社会情绪	74

三、结构性压力的后果	78
四、社会团结的风向标	81
五、营造可持续的社会共识	83
结 语	86
第三章 网络动员与参与：淘宝店“肉铺”的震后募捐机制解析	89
引 言	89
一、官方与民间：灾后募捐动员格局	90
二、网络动员：“肉铺”是怎样动员资源的	94
三、网络参与：网民们如何反应	100
四、动员效能：动员成败及其背后	105
结 语	108
第四章 “娱乐化恶搞”与无权者的抗争：从“性侵女童案”说起	110
引 言	110
一、娱乐化趋势与“恶搞”的流行	111
二、无权力者的权利抗争	113
三、“娱乐”会“至死”吗	119
四、娱乐化的必然与阈限	122
结 语	125
第五章 网络空间中的共同体与公共性：“正能量”视角下的“张丽莉事件”	127
引 言	127
一、“正能量”引爆“小宇宙”	128
二、“正能量”背后的失范现象	132
三、“共同体想象”与社会认同	137
四、公共性建构：社会管理的一束阳光	142
结 语	146
第六章 网络社会的公共性难题：以“周口平坟事件”为例	149
引 言	149
一、网络社会的公共性难题	151
二、网络缺位群体的集体失声	155
三、网络公共议题的“差序格局”	159
四、网络公共性的实现困境	164
五、构建网络公共领域	167

结 语	171
第七章 从认同危机到合作性认同：“什邡事件”引发的思考	174
引 言	174
一、网络化时代的“合法性认同”危机	175
二、网络社会认同的演变	183
三、网络化时代的合作性认同	190
结 语	198
第八章 公共卫生问题的治理困境与超越：以“黄浦江漂猪事件”为例	201
引 言	201
一、公共卫生问题的网络传播	202
二、公共卫生问题原因的网络追问	206
三、公共卫生问题的治理困境	210
四、关于摆脱困境的几点思考	214
结 语	217
第九章 当网络遇到法律：网络立法之争	220
引 言	220
一、网络立法争议中的对话之难	222
二、国家主导的网络立法	231
三、互联网时代的法治困境	238
结 语	245
附录 2012—2013 年度重要网络事件	249
后 记	261

导论 网络化时代社会认同的深刻变迁

2012年至2013年，中国互联网继续呈现异常活跃的状态。不仅网民队伍持续扩大，而且网民参与网络活动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特别是接踵而来的网络事件，表明网络行动已经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过去的一年里，最令人瞩目的网络事件莫过于网络反腐，人们生动地称之为网络反腐风暴。虽然在杨德才、雷政富、刘铁男等贪腐官员落马事件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纪律检查部门和司法机构，但网络围观、网络批评显示出的舆论力量和信息权力，确实起到了重要甚至是关键的作用。从一系列的网络反腐事件可以看出，网络舆论和信息权力在揭露和打击贪污腐化的行动中功不可没。基于这个事实，本期研究报告专设了一个年度主题报告：网络反腐。

其他方面的网络事件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网络助燃下的“保钓游行”，雅安震后开展募捐活动的淘宝网中的“肉铺”，性侵女童案引起的网络恶搞与抗争，周口平坟事件引发的网络公共性难题，什邡事件中网上与网下联动的环境保护行动，还有引起广泛而强烈网络反响的“张丽莉事件”等，这些网络事件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网络行动的能量与作用，展现了网络社会旺盛的活力和广阔的前景。

在网络反腐和其他一系列网络事件中，有很多引人深思的问题和值得深入阐述的道理。这里，我们集中论述这些网络事件中的核心问题——社会认同的深刻变迁。

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快速发展，社会认同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并且这个话题所反映的内容也日渐复杂。这不仅因为社会认同是网络行为的核心因素，在日益增多的网络事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在于社

会生活网络化促使社会认同发生了形式与内容、地位与作用的深刻变迁。特别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认同在网络化过程中呈现的一系列崭新问题更加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社会认同研究的转变与限制

社会认同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很多学者在20世纪前期就已经对社会认同开展了大量研究，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讨论社会认同的文献仍主要是关于个体自我认同的，诸如关于个体的身份认同、群体归属、地位和层次认知等，都属于通常的社会认同研究。因此，一些社会学家认为，20世纪前期的社会认同研究实质是个体认同研究，真正从社会层面开展的认同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或70年代。特纳曾明确指出：“社会认同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①

方文论述了社会认同研究在社会学心理学中发生的从个体向社会的转变。方文认为，在1967年，社会心理学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一个事件是被誉为“社会心理学教皇”的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 1919—1989）厌倦了个体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导致了“社会心理学危机话语”的发生；另一个事件是泰弗尔（Henri Taifel, 1919—1982）和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 1925— ）举起了“社会关怀”旗帜，开始了群体认同或群际认同的研究。这两个事件共同宣告了个体论的社会认同研究的突破。^②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社会认同研究从个体向群体乃至社会的转向，虽然应当看到是通过心理学家研究方式的转变而实现的，但这种转变为什么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的？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后期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为这个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1967年，丹尼尔·贝尔发表了《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札记》，同年加芬克尔出版了其代表作《常人方法学研究》。笔者曾指出：“贝尔以后工业社会理论直接概括和揭示了科技革命引起西方社会的深刻变化，而加芬克尔则是以社会学思维方式变革的理论主张和原则建构，间接地表达了对科技革命引起社会变革的理解和体验。”^③ 费斯廷格、泰弗尔和莫斯科维奇等人在心理学领域引起的转变，其实同贝尔和加芬克尔的研究一样，都不过是对科技革命推动后工业社会来临的一种

① 转引自 [澳] 豪格、[英] 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前言，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② 参见方文：《“文化自觉”的阶梯》，见上书，总序，2页。

③ 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5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学术反映。

由科技革命推动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之所以能够促进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突破个体论限制，最重要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后工业社会实现了产业结构转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迅速上升。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已经达到70%以上。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表明，面对物或面对自然的物质生产地位已经下降，而为人服务的第三产业已经上升到主体地位，因此，发达国家的中心任务已经从物质生产转移到为人服务。物质生产处理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处理的主要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种变化必然要求人文社会科学超越个体论的视角，切实从社会关系的视野观察和研究社会生活。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推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变迁的技术革命是信息技术革命，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不仅大幅提升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规模，而且还极大地扩展了人类信息交流的途径和空间，提高了社会交往的地位。信息技术革命以其不可遮挡的魅力，把越来越多的人从狭小的个体活动场所带入广阔的社会交往领域。各种场所中的群体活动，甚至超越群体界限的、在更广泛层面上的信息交流，都呈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之前无法实现的活跃状态。人们通过日益便捷的信息交流或更加广阔的信息空间，不仅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他人，也能更明确地理解自己。原来在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局部空间中不易判明自己身份归属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在复杂的信息交流中认识群体乃至认识社会。

因此，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认同的研究从个体论转向群体论，其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为研究者的心理变化和视角转变，更重要的是社会现实发生了深刻变迁。并且，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发展，更明确地从现实基础出发，要求社会认同的研究实现转变。时至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和手机通信等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这使信息技术革命形成了更加波澜壮阔的局面，社会生活实现了大规模的网络化变迁。人们在网络化潮流中涌入越来越广阔的社会空间，城市社会、民族社会乃至全球社会，人们可以凭借新媒体技术便捷地进入其中。在不断扩张且充满新因素和不确定性的网络社会中，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自我属于这个社会的哪一个位置，而是自我应当怎样看待和评价这个瞬息万变的新型社会。

卡斯特是对网络社会开展了深入研究的学者，在他看来，网络社会是一种与工业社会在农业社会中崛起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新社会形态，而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以互联网和手机通信等新媒体为基础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

中开篇就指出：“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的对立趋势所塑造。”^①之所以把认同与全球化看成一种对立趋势，并坚持在这种矛盾关系中审视网络社会崛起引起的各种社会变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各国政府推进的“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②，它不仅引起了世界经济秩序新变化，而且也冲击甚至剥夺了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各民族的基层社会成员形成了抗拒性的集体认同，抗拒性认同通过网络媒体实现了穿越传统社会制度的横向连接，并动员起激烈冲击全球化秩序的各种大规模社会运动，表现出抗拒性的集体认同是必将引起人类社会发生空前深刻变革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卡斯特兴奋地指出：“伴随着技术革命、资本主义转型、国家主义让位，我们在过去的 25 年里经历了集体认同强烈表达的漫天烽火。这些集体认同为了捍卫文化的特殊性，为了保卫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加以控制，而对全球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提出了挑战。”^③

从卡斯特的论述中不难发现，他像泰弗尔等人一样重视的不是个体认同，而是集体或群体认同。然而，在卡斯特的论述中会发现，同泰弗尔不同的是，卡斯特实质上已经超越了泰弗尔的群体认同论视野，通常是在论述超出群体边界的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认同。虽然卡斯特一再强调自己论述的认同是与个体认同不同的集体认同，但他论述的集体是没有清晰边界的，吸引了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以及不同工作职业的社会成员参加的社会运动。在社会运动中的认同已经不是泰弗尔仅仅超越个体认同的群体认同，而是凭借信息交流和网络沟通超越了各种集体边界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认同。

这里面对的问题是，卡斯特为什么坚持用集体认同概念来表达实质上已经超越了集体边界的社会认同？这或许是主流社会学的结构论研究方式的限制。从涂尔干开始的结构论研究方式，虽然也重视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研究，但结构论的基本视角首先是注意事物的构成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或者说，实现结构论这个研究目的必须以弄清事物的构成要素为前提。正是基于这种基本原则，当卡斯特从结构论视角观察社会认同时，尽管已经认识到网络社会中的认同是可以超越各种边界限制的社会认同，但仍然总是在结构论视野中寻找社会认同的构成，而寻找的结果只能是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难以看清整体意义上的社会认同。只有超越结构论的限制，才能从整体上把握突破了群体或集体边界的社会认同。

①② [美] 卡斯特：《认同的力量》，1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③ 同上书，2 页。

二、网络化时代的社会认同分化

超越结构论研究方式最有效的办法是从对社会现象的静态分析转向实践论的动态考察。结构论和实践论同属于社会学创建以来一直延续的两大传统，如果说结构论因注重对事物构成结构的分析而容易走向静态观察，那么实践论则因对人们社会行动的考察而注重事物的运行变化及动态趋势。并且，正是因为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去认识人类社会，坚持实践论立场就能从本质上把握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演化趋势，其中道理如马克思所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①

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既包括处理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物质生产实践，也包括处理人与人矛盾关系的交往实践。因此，齐美尔论述的人类交互行动，韦伯和帕森斯论述的社会行动，以及福柯和利奥塔论述的话语实践，哈贝马斯论述的交往行为，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感性实践等思想观念，都能在马克思那里找到根源和影响。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之所以能在社会学领域保持广泛影响和持续承继，其根本原因在于实践观点符合社会生活的本质，立足实践就能在人们同自然和他人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在动态的社会行动中，看到一个由无数个体和群体展开的现实的社会。

由信息技术革命推动而成的网络社会，其基本内容是人们的信息交往实践，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活跃、最复杂、最广阔的实践场域或社会空间。因此，理解网络社会的问题就更应当从实践观点出发，只有用实践的眼光或实践的思维方式才能从本质上把握网络社会的矛盾及其展开形式。实际上，卡斯特也受到了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影响，他在论述网络社会的核心问题即社会认同时，不仅论述了由社会认同凝聚的各种对抗全球化冲击的社会运动——各种文化传统中的社会运动本身就是社会实践，并且还论述了网络社会作为社会认同发生的语境和存在的基础，其本质就是社会实践。卡斯特指出，网络社会展开了流动空间，“流动空间乃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基础”^②。

把社会认同与网络化时代的社会运动和流动空间联系起来，或者说把社会认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② [美]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曹荣湘译，383~38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研究置于网络社会基础之上，既能认清社会认同的现实形式，也能发现社会认同的强大力量。从社会认同的现实形式上看，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都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认同，因为个体和群体不过是社会的构成要素，他们只有超越自身的边界，实现没有边界限制的社会联系，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的主体是社会，而不是个体和群体。社会主体是通过个体和群体的交往联系而形成的，所以个体和群体只有进入交往过程、形成交往联系，他们的认同才能会聚为社会认同。因此，不仅只有在交往关系中才能认清社会，而且也只有交往关系中才能把握社会认同。

网络社会的崛起，既为个体和群体提供了可以超越自身界限的有效机制，也为他们的认同能够汇集为社会认同提供了便捷途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的直接限制，所以传统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讨论社会认同时，或者努力阐明个体因所处经济条件、生活状况和职业区别的限制而产生的身份认同，或者具体分析在不同群体构成、组织结构和制度关系中发生的群体认同。而到了网络化时代，个体获得了相对自由地表达意愿和评价的灵活手段，微博、飞信、QQ 和视频通话（facetime）等形式多样的网络设置，使个体乃至他们身处其中的群体脱离周围环境的限制，进入广阔的网络空间开展信息沟通，形成千百万个体以及无数群体共有的社会认同。

网络社会中的社会认同，是在社会空间分化的条件下生成的。在网络社会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 Web 1.0 时代，人们把 BBS 和聊天室等早期网络设置展开的社会空间称为虚拟空间；而到了 Web 2.0 时代，网络社会迅速扩展，不仅网络交往形式更加灵活，而且交往空间也迅速扩大，涌入的人数也爆炸性地增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网络社会已经不是虚拟空间，而是同传统社会在存在空间上明显分化了的新社会形态。网络社会崛起引发的社会空间分化有三种基本形式：

其一，传统社会的在场空间。虽然网络化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推进，但至今没有利用网络技术开展网络交往的人仍然占人类总量的 2/3，特别是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网络技术和人们的信息交往能力还处在一个较低水平，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处于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初期阶段，可以称之为未网络化的传统社会的在场空间。

其二，在场的网络空间。与日俱增的个体和企业组织、社会团体、行政机构开展了活跃程度不断提高的网络活动，他们“脚踏实地”地进入了网络空间，也就是说他们以真实的身份、在特定环境中为了追求现实的利益目标而展开了网络交往。可以称这种网络行为展开的网络空间为在场的网络空间，亦即个人或群体在特定场

所中的网络活动所展开的空间。

其三，缺场的网络空间，即由数量急剧上升的个体和很多群体隐匿自己的身份和实际存在形式，参与不受地方性条件和制度规定限制的网络活动而形成的网络空间。这种被吉登斯称为“脱嵌空间”和被卡斯特称为“缺场空间”或“流动空间”的网络空间，是网民信息交流比较自由，思想观点容易汇集起来并形成共识的开放空间。

于是，当代人类社会在网络化推动下起码形成了三种空间状态：传统的尚未进入网络的在场空间，已经进入网络交往的在场空间，匿名的脱离了地方条件限制的缺场空间。三种空间状态的关系是：在场的非网络空间与缺场的网络空间是一种空间外延不重合的分离关系，前者具有相对确定性，而后者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前者具有地方局域性，而后者具有空间扩散性；前者具有个体和群体的边界性，而后者具有社会交往的互动性；前者具有实名性和公开性，而后者具有匿名性和隐蔽性。介于二者中间状态的是在场的网络空间，它同其余两者的外延是交叉关系，更明确地说，处于在场的网络空间中的个体和群体，可以通过新媒体技术大规模地进入网络社会空间，是以其在场的存在开展了缺场的活动。在场的网络空间的这种中间性，使其具有了传统社会的在场空间和缺场网络空间的综合性特点。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为三种社会空间的同时并存，当代社会认同也呈现了一种层级分化状态。在传统社会的在场空间中，认同主要是个体的身份认同和群体的集体认同；在缺场的网络空间中，认同主要是超越了个体和群体边界的社会认同；而在介于二者中间的在场的网络社会中，认同主要是从个体和群体认同向社会认同提升的过程。简言之，在传统社会的在场空间中，社会认同是以个体和群体的初级形式存在的；在在场的网络空间中，社会认同是从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向社会认同提升和扩展的过程；只有到了缺场的网络空间中，社会认同才超越了个体和群体的界限而进入到了无边界、不确定、分延扩散的高级层次。

从当代人类社会三种空间并存的状态，可见社会生活网络化是一种如图海纳所论的“断裂式发展”。从网络技术的功能上看，网络化应当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但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一些人对网络技术认识与使用的滞后性，直到目前为止，全球仍有 2/3 的人口没有直接进入网络活动。虽然不能说他们完全处于网络化过程之外，但其中确有相当规模的人口过着对网络化发展和网络交往活动不了解、不参与，甚至反感和排斥的生活。这些处在网络化进程之外的人，如果不能接受网络化的影响而改变外在于网络社会的状态，就是图海纳所说的那部分被当代社会快速发展而甩到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生活和观念都会成为断裂于当代社会的构

成。并且，这些人的生活是被动地受到地方条件、制度环境和文化传统限制的构成，他们的认同通常只能处于个体身份认同至多是群体环境认同的层次。

与外在于网络社会的人截然不同的那些已经敏感地进入缺场的网络空间的网民。这些在全球人口中已近 1/3、在中国人口中已超 2/5 的网民，他们或者以完全匿名的形式进入全球性的缺场网络空间，或者以前台匿名而后台实名的形式进入全国性的缺场网络空间，而无论哪种形式都表明他们已经超越了个别位置、特定条件的限制，并因此而不必再去专注自己属于社会的何种身份、何种地位与何种归属，甚至不必在意所在群体的关系制约和制度规范，而是从社会的一般原则、普遍意志和共同价值去表达自己的认同。缺场网络空间中的社会认同已经不能用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的内涵去理解，在作用于各种社会运动和重大群体事件的网络认同中，认同的主体是由网络交往连接而成的社会，认同的性质不是为个体判定身份归属，而是表达对社会的要求，是反对与赞成、否定与承认等有强烈价值要求和明确价值取向的建构性的意义认同。

三、从集体表象到社会表象的提升

虽然缺场的网络化的社会认同因其匿名性、脱域性和扩散性等特点而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大量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但就其总体趋势而言，缺场的社会认同对全球化和个体化两种相背趋势对立并存的当代人类社会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正像福山在《大分裂》中论述的那样：“正当西方社会的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渡之时，却出现了这样一些负面的社会趋势；这些趋势说明，西方社会中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正在变弱。”^① 福山所说的负面的社会趋势，是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发生的个体化趋势。这种使工业社会的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弱化甚至解体分裂的个体化趋势，是以网络信息技术支持的个体化工作方式的形成为前提的。正是个体借助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信息技术，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工作空间和工作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追求个体价值、个体地位和个体自由的价值原则，才导致了工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价值体系的大分裂。

福山论述的这种社会分裂现象，在工业化处于上升时期的 20 世纪初也出现过。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等著作中论述的社会分化问题也具有价值体系分裂、社会

^① [美] 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5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